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俗语儿典》 编纂及其学术意义

李无未, 孟广洁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日本明治之前的汉语词典以收录、解释书面语为主。明治时期,在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需求下,语言教育的基础由书面语转为口语,其汉语词典也随之呈现出新的编纂模式。《北京俗语儿典》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一部词典。这部词典收词以当时北京官话口语中的常用俗语为主,按拉丁字母顺序进行检索,以口语中的真实语句为引例。从词典编纂角度来说,《北京俗语儿典》具有较强的学习性功能,开创了学习型汉语词典的编纂模式,比西方的英语双语学习型词典早50余年;从汉语教学角度来说,《北京俗语儿典》具有速成性特点,它所体现出来的“句型”教学法比西方的听说教学法早20余年。因此,这部词典很值得研究。

[关键词]《北京俗语儿典》;学习词典;日本明治时期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4)06-0153-07

一、引言

日本明治时期,在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需求下,在政治目的的驱使下,汉语教学事业迅速发展。“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不仅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使日本的中国语教育走上了同政治挂钩的语言教学之路。……教育主要是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同远东政治格局紧密相连。”^{[1]22-26}为了满足经济和军事扩张的需要,如何最大限度地、高效地发挥汉语词典的学习功能,成为这一时期词典编纂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本国内汉语教学的强大需求之下,《北京俗语儿典》^[2]应运而生。这部词典的产生是为汉语教学服务的,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汉语学习者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言语能力。既然《北京俗语儿典》的编纂目的不同于日本传统词典,因此这部词典也不适合按照传统词典的编纂模式进行编纂。《北京俗语儿典》结合当时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教学理论,在词典编纂模式上进行了尝试性探索,以期构建一种新型词典的编纂模式。

二、《北京俗语儿典》编纂体例

《北京俗语儿典》,下永宪次编著,东京偕行社1926年出版发行。下永宪次出身戎伍,曾在东京外

[收稿日期]2014-04-14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挖掘与明清汉语研究”(12&ZD178)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无未(1960-),男,吉林敦化人,主任,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古籍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评审组成员。

国语学校学习过汉语,他非常重视语言在战争中的作用,编写了大量的日满、日蒙、日汉等教科书和工具书,《北京俗语儿典》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工具书。编者在这部词典的序言中这样说道:

支那の文章言語中格言俗諺の多き他國に其の比を見ざる處にして、其の關する處人情風俗氣象風土道德地理歴史及び哲學等凡百の事之に表れざるものなし。故に讀書會話に際し其の必要を感ずるは勿論、苟も支那の研究を志し、其の微を極めんと欲せば、必ず此を研究せざるべからず。……

下永宪次曾长期生活在北京。他发现北京日常口语中儿化词及惯用语在口语表达中较为常见。因此,他有意收集整理这些资料。在《北京俗语儿典》序言中,他特别强调了学习北京儿化词及惯用语的重要意义,认为北京儿化词及惯用语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在日常口语交际和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一些俗语、谚语等惯用语或成语。尽管在其他国家的语言中也有这样的惯用语,但在汉语中尤其常见,如果不了解这些惯用语,即俗语结构和特点,那么就很难进行交际,阅读文学作品也会遇到障碍。因此,掌握一定数量的常见北京儿化词及惯用语是十分必要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语这些独特的北京儿化词及俗语、谚语等惯用语,除了有交际的现实效用之外,对于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气象、地理、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内容,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下永宪次编写了《北京俗语儿典》,他希望学习者通过使用、学习这部词典,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学会地道的北京官话。基于这样的编纂目的,下永宪次在构建《北京俗语儿典》编纂体例时确实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一)《北京俗语儿典》检索方式

日本明治时期以前的词典编纂受传统词典编纂思想的影响,在检索方式上主要采用部首查字法、义类索词法、假名音序法进行检索。而《北京俗语儿典》采用了按拉丁字母顺序进行检索的音序检索方法,即按照词语第一字声母的拉丁字母顺序进行检索。这部词典的“目次”分为“A之部”、“C之部”、“E之部”、“F之部”、“H之部”、“I之部”、“J之部”、“K之部”、“L之部”、“M之部”、“N之部”、“O之部”、“P之部”、“S之部”、“T之部”、“W之部”、“Y之部”,一共17部。以音序检字法进行排列较传统词典来说是一大进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检索方式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体现了这部词典的现代性。但拉丁字母有26个,17部就不免难敷所用。很显然,下永宪次在将词语进行归部时,出现了一些麻烦。

(二)《北京俗语儿典》收词语范围

在《北京俗语儿典》序言中,下永宪次说明了收词范围,即以俗语、谚语、成语等惯用语为主,特别是当时北京周围各类人所使用的最常见的口语和书面语中的惯用语。儿化词语当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部词典收词2000余条,而儿化词语占了60%以上,比如“爱好儿作亲”、“爱亲儿作亲儿”等。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我们当然可以做出相应的分类。

1. 从《北京俗语儿典》所收词语的类型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第一,俗语、谚语等。例如“卖瓜的不说瓜苦,卖酒的不说酒薄”、“拿着好心当了驴肝肺”、“娘亲舅大”、“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天长正好眠,秋去冬来天又冷,归着书箱过新年”^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

第二,成语。例如“年高有德”、“下井投石”、“小题大做”、“恩将仇报”、“耳鬓厮磨”等。

第三,在口语表达中常用的固定格式,不是俗语、谚语等惯用语,但读起来有一定的韵律。例如“喝酒喝厚了”、“喝醉了不算”等。

第四,交际中常见的句子。例如“反复无常是小人”、“放着一个揖不作,要做俩揖”、“风大看闪了舌头”、“逢人不说闲事,便是人间无事人”、“夫妻没有隔夜愁”等。

2. 从《北京俗语儿典》所收词语表达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例如“只许官家放火,不许人民点灯”、“吃官饭放私骆驼”、“治酒容易请客难”、“车船店脚牙无罪就该杀”、“当穿袍子,没有看不见亲家的”等。

第二,与生活态度有关的。例如“挨勤的没懒的”、“挨着大树有柴烧”、“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

^① 原文是“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天长正好眠,秋去冬来天又冷,归着书箱过新年”,笔者将“眠”改为“眼”。

思有时”、“朝中有人好做官”、“睁一眼儿闭一眼儿”、“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乞随乞 嫁寇随寇”等。

第三 与生活经验有关的。例如“暗剑最难防”、“茶吃后来酹”、“馋当厨子懒当家 要看媳妇儿去卖花”、“趁我十年运 有病早来医”、“吃辣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等。

3. 从《北京俗语儿典》所收词语来源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

第一 来自典籍的。如“矮子队里选将军”可见于《小五义》、《施公案》及李渔《十二楼·夺锦楼》,“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出自《论语》,“暗室青天、神目如电”出自《警世贤文》,“常将有日思无日 莫到无时思有时”出自《增广贤文》,“集腋成裘”出自《慎子·知忠》,“既在矮檐下 怎敢不低头”出自《水浒传》等。

第二 来自方言俚语的。如“张郎找李郎”来自客家方言,“当穿袍子 没有看不见亲家的”来自山东方言,“趁我十年运 有病早来医”来自粤方言,“正月十五雪打灯 八月十五云遮月”来自天津方言,“记吃不记打”来自东北方言,“既在江边站 便有望景心”来自湖北方言等。

从收词上来看 这部词典收词范围广泛 儿化词语较多 所收词语带有明显的口语交际性 有些俗语在日常口语中经常出现。学习这些俗语及儿化词对于培养汉语交际能力来说 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这部词典具有学习和实用价值。

(三) 《北京俗语儿典》释义方式

《北京俗语儿典》在释义上的最大特点即采用描写式的释义方式。词典的释义方式主要有三种 即互训式、定义式和描写式。传统词典多采用互训式的方式释义 而在现代词典中 常采用后两种释义方式。日本明治早期的双语词典 一般在释义上采用互训式的比较多 即在第一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词或者短语来解释目的语。《北京俗语儿典》则使用一个完整的句子 对词语的意义进行详细描述 用汉字加假名的方式解释出词语的意义。例如:

(1) 爱财如命(解)財産を愛する事生命の如し。〔例〕他的品行真高就是一样儿爱财如命。

(2) 暗剑最难防(解)暗劍最も防ぎ難し、陰謀避け難し。〔例〕暗剑最难防 到底受了他的害了。

(3)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番新人换旧人(解)揚子江の後の浪は前の浪を催し一般新人は舊人に換る。〔例〕这几年我没来敢情换了好几个掌柜的了 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番新人换旧人。

(4) 这山望着那山高(解)此の山から見れば彼の山高し。常に場所を換えたがる。〔例〕僂别、这山望着那山高好々儿的在这儿忍着罷。

在上述举例中 词语的意义都是用一个句子来进行解释的 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受到词本身的限制 俗语、谚语等惯用语作为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并传播的口头语言 本身凝结了丰富的语义内涵 因此很难用一两个词解释得清楚 所以互训的释义方式行不通。另一方面 用解说性的语言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词的意义 只有在充分了解词语意义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更好地学习词语的用法。

(四) 《北京俗语儿典》引例

这部词典以收录俗、谚等惯用语为主 编纂目的是为学习北京话服务的 因此其引例多来自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北京话口语语句 具有较强的交际性。引例一般一到两个 主要以北京话句型为主 还包括少量的北京话会话。

北京话句型形式的引例如“老爷子那么大岁数僂别离远了。俗言说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叫自己去。”(见“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叫自己去”条)“他是个欺软怕硬的 僂打他一顿就好了。”(见“欺软怕硬”条)“人死了就完了。常言说 气化清风、肉化泥 那儿有鬼呀?”(见“气化清风、肉化泥”条)

北京话会话形式的引例 如“那个孩子怎么一来就哭啊? 僂忘了 家富小儿骄麽?”(见“家富小儿骄”条)“僂这几年竟教学事情不错罢? 别提了 家有三石粮 不做孩子王。”(见“家有三石粮 不做孩子王”条)

^① 这里所谓的“来源”并不是指真正的出处 而是指这些俗谚经常出现在某些典籍或者某个地域而已。此处参考了《俗语词典》(徐宗才、应俊玲,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汉语熟语大辞典》(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俗语考原》(影印本 李鉴堂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无论是句型还是会话,这些引例都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北京话口头语言,因此能够直接应用于北京话口语交际中。这部词典在引例上选择北京话口语化的例句,不仅是区别于传统词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而且也打破了传统词典在引例上追求经典文献例句的引例方式。这也是《北京俗语儿典》积极探索新的词典编纂模式的结果。

《北京俗语儿典》的编纂模式和日本传统词典的编纂模式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日本词典的编纂传统和中国词典的编纂大致是相同的,检索方式以部首检字法为主,收词尽可能大而全,强调规范,释义以互训为主,引例来自经典文献,例如《和名类聚抄》等就是如此。但是,从《北京俗语儿典》检索方式、收词、释义和引例四个方面来看,当代所具有的对外汉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模式已经初露端倪。关于当代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对其编纂特点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如周小兵^{[3]84}、郑定欧^{[4]92-93}等认为,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收词应以常用词为主,释义要用简洁易懂的单句,引例要富于口语化等,这些学习型词典的特点在《北京俗语儿典》中都有所体现。

三、《北京俗语儿典》的学术意义

《北京俗语儿典》编纂于日本明治后期,其编纂体例呈现出双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特点,其收词以北京及周围地区的口语为主,引例采用当时实际交际的北京口语语句,这为我们研究清末民初的北京官话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因此,无论从词典编纂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汉语词汇史、汉语语言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部词典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这部词典的编纂是为满足语言教学服务的,因此对于研究对外汉语教育史也具有重要价值。

(一) 《北京俗语儿典》在词典编纂史上的学术价值

《北京俗语儿典》突破传统俗语词典的一般性功能,强调以教授北京口语官话为主,从汉语学习的角度来说,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交际实用性、学习性特点,体现了当代汉语学习型汉语词典的编纂特点。

1. 《北京俗语儿典》从编纂功能上来说注重交际实用性。

从现有的双语学习词典的使用功能上来看,一般还停留在双语词典的一般性功能上,即查阅的工具化功能。《北京俗语儿典》已经突破了双语词典的这一最传统、最为一般性的功能,其功能由查阅转向学习。这一转变,通过上述对该词典编纂特点的论述便可窥见一斑。就检索方式来说,采用音序检索法,我们姑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真正地适用于汉和双语词典的编纂,单单就检索方式的便捷性来说,较传统的部首检字法确有进步,明显地提高了使用效率。因此,实用性大大增强。就收词的实用性来说,《北京俗语儿典》主要收录北京口语中常用的俗、谚等惯用语。这些俗、谚等惯用语在北京日常口语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学习这些俗语以及口语表达中的常用句型,对提高汉语表达能力来说确实具有实效性。就释义方式来说,《北京俗语儿典》打破了传统以词释词的互训释义方式,采用以句子扩展说明词语的描写性释义方式,这让学习者对词语意义学习更加清楚准确,避免了循环互释带来的不对称困扰。这也充分说明,这部词典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从引例来看,《北京俗语儿典》引例来自北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口语语句,学习者通过这些语句,可以直接运用到实际交际中,不需要刻意地学习文法,从而提高了北京话口语学习的效率。

《北京俗语儿典》的编纂非常注重实用性,编者也在尽最大努力寻找实现词典实用性的有效方式。这部词典尽管编纂于20世纪之初,但就对词典实用性的把握来看,不逊于当代的汉语学习词典。

2. 从《北京俗语儿典》使用讲求“速成”性来说,十分注重学习的效率。

许多学者已经把语言教学的目标定位在了培养语言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上。尽管20世纪初对外汉语教学还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学科理论和知识框架还未形成,更不用说有系统的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理论了,但由于语言学习的客观需求真实存在,语言学习的教科书和词典编写活动也伴随着语言学习的客观需求而调整自己的目标定位。《北京俗语儿典》编纂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培养北京口语学习者的交际能力。更直接地来说,就是为使侵华日军迅速学会北京口语的日常交际用语。这一编纂目的不仅通过收词有所体现,丰富的口语化引例更是充分有力的证据。因此,这部词典在充分重视交际实用性基

础上更体现了其注重学习速成性的特点。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北京俗语儿典》最大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它打破旧有的规范词典的编纂模式,关注的重心从编纂者转移到学习者,从关注编者的思路转向使用者的学习需求。由其编写风格可见,更侧重于描写,所实现的编写功能在于交际。从教学追求上来说具有明显的速成性。《北京俗语儿典》可以说是日本明治时期学习型北京口语词典编纂的典范之作。

纵观西方词典的发展历史,从较早的约翰逊的《英语词典》(1755),到1934年梅里亚姆公司的Web2,基本上都是以规范主义的编纂理论为指导的。随着描写语言学的发展,词典编纂倾向也由规范理论主导型转向描写理论主导型,并且逐渐由描写理论主导型,转而发展成为以注重实用的学习型为主导原则。在实用学习型为主导原则影响之下,西方的英语学习词典随之产生。根据《英语学习词典史》导读所述,英语单词的学习词典形式,大概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5]F24-F25},而像《北京俗语儿典》这样的双语学习词典,出现的时间则更晚一些,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这样看来,《北京俗语儿典》早于英语双语学习词典有50余年。作为西方英语学习词典的先驱之一帕尔默(Harold E. Palmer)是非常优秀的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学家,他曾经担任过东京英语教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对日本的英语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下永宪次有可能受到帕尔默关于英语学习词典编纂理论的影响,并发展了帕尔默关于学习型词典的理论,编纂了具有双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特点的《北京俗语儿典》。

(二)《北京俗语儿典》在对外汉语教育史上的学术价值

《北京俗语儿典》编纂于日本大规模对外扩张侵略之初。此时的日本,在汉语教学和学习方面的需求非常之大,尤其是快速有效地学习汉语的“短期效应追求”更为强烈。《北京俗语儿典》不仅在词典编纂模式上做出了有效性的尝试,从北京口语学习方法上也有所创新,依然强调对“速成”性的追求。

1.《北京俗语儿典》强调以句型为核心的北京口语教学方法。

《北京俗语儿典》每一个词条一定包含至少一个引例,所有引例均来自日常北京口语的真实语句。通过学习这些句型,可以直接应用于北京口语交际中。因此,这些句子是快速有效地学习北京口语的法宝。《北京俗语儿典》没有过多语言知识的介绍,甚至连词语最基本的读音形式都没有做讲解,只是用日语解释了词语的意义。每一个词条的解释重心都放在了引例上,也就是句型模式上。通过学习、反复操练这些句型模式,可以快速学习北京口语交际中的实际句子并直接应用于交际实践,体现了句型在北京口语学习中的重要性。这种通过学习句型来学习北京口语的教学方法,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美国非常流行的外语学习方法,即听说教学法不谋而合。听说教学法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翻译培养工作的实践经验,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听说教学法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有结构的习惯性行为,是通过“刺激(stimulus)—反应(response)”这一过程以模仿和重复学习来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听说教学法强调句型是语言教学的基础,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以句型为中心来展开。语言教学的过程是通过“刺激—反应”而形成新的语言习惯的过程,因此,通过对句型反复模仿、操练、记忆、重复等实践活动可以学习语言。在听说教学法看来,语言教学是教语言本身,即培养语言能力,而不是教有关语言的知识。^{[6]248-251}《北京俗语儿典》所体现出来的北京口语句型教学法,和西方的听说教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比西方的听说教学法早了30年,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法的历史演进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北京俗语儿典》为研究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存在的北京口语中介语系统提供了第一手语言材料。

中介语是指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一定的学习策略,在目的语输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其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的语逐渐过渡的动态的语言系统。^{[6]169-170}《北京俗语儿典》的编者是母语为日语的日本人,作者在运用自己所学的北京口语编写汉语词典时,必然受其母语的影响。因此,在《北京俗语儿典》中,以日语为母语的北京口语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在根据词目首字的发音而进行归部的过程中,编者没有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进行区分,例如以“D”为声母的字放入了“T之部”,以“B”为声母的字放入了“P之部”,以“K”为声母的字放入了“G之部”。另外还有以“R”为声母的字放入了“J之部”。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编者受

到其母语的影响,产生了负迁移。在日语中,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没有区分的,显然编者没有注意到北京口语和日语在发音上的不同,未能准确标音。再如一些引例也出现这样系统性的偏误,例如:

(5) 敢情他写得很好一笔字, 儻瞧, 真人不露像(相)、露像(相)不真人。(见“真人不露像(相)、露像(相)不真人”条)

(6) 倘若是不跟他那些话事情那儿能坏儻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条)

(7) 枪子儿把我帽子打掉了会没受伤。俗言说枪子儿有眼睛麽。(见“枪子儿你有眼睛”条)

(8) 我有为难事他很来帮助我, 这就是交友满天下知心有几人。(见“交友满天下知心有几人”条)

在例(5)中,“很好一笔字”有语法错误,例(6)中的“话”和“说”的用法混淆,例(7)中的“会没受伤”,“会”的用法有误,例(8)中的“很”和“肯”读音混淆,“k”和“h”不分,这些都属于日语学习者在学汉语时的系统性偏误,是中介语系统的组成部分,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3. 《北京俗语儿典》对北京口语会话理论的建构和运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北京俗语儿典》的引例基本上都是北京口语句型,但是其中也包含少量的北京口语会话。这些北京口语会话式的引例为进一步研究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口语会话理论的构建和运用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例如:

(9) 我看他也许要打。怎么见得哪。儻瞧, 既在江边站便有望景心。(见“既在江边站便有望景心”条)

(10) 儻怎么这么晚才来。别提了我是起早赶晚集。(见“起早赶晚集”条)

(11) 俗言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话实在不错, 我看没有一家和睦的。(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条)^①

《北京俗语儿典》中的北京口语会话,充分体现了日本明治时期学界所思考的北京口语会话理论的一些重要特征和原则。当代会话理论是20世纪中后期才出现的,《北京俗语儿典》对北京口语会话的认识和运用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会话理论不谋而合。在《北京俗语儿典》的会话中,有一些有助于北京口语会话展开的标记,如“别提了”表示对自己要说的话无可奈何,“你瞧”表示说话前要提醒对方注意,“这话实在不错”表示对说话者的肯定。每段会话基本上都有一些会话标记,在没有以问答作为典型的会话标记的情况下,这些会话标记有助于北京口语会话的展开。

(三) 《北京俗语儿典》在汉语史研究上的学术价值

日本明治初期中国语教育的语言基础主要是南京官话。从明治九年开始,由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转移。到了明治后期,中国语教育语言基础以北京官话为核心,北京官话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日本明治时期很多汉语教科书和工具书所收常用词语以清末北京官话和北方社会流行语为主。《北京俗语儿典》所收常用词语就是以北京官话口语中的惯用语为主。其中,有许多是“儿化词语”。由此,它为研究北京官话口语中儿化词语的演变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标题中的“兒”即“儿”,编者就强调了北京官话中的儿化现象。在整部词典的收词和引例中,粗略计算儿化词语大约占60%以上,有些如“爱好儿作亲”、“爱亲儿作亲儿”中的儿化词语在现代北京话中已经不读了,有些如“睁一眼儿闭一眼儿”、“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中的儿化词语在现代北京话中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将这部词典中的儿化词语进行搜集整理,通过与现代北京话中的儿化词语进行比较,进而研究北京儿化词语的演变问题,肯定会有所收获。

《北京俗语儿典》所收词语,再现了清末民初北京及周围地区的社会概况和风俗人情,反映了北京官话口语的基本面貌,为清末至民初北京官话俗语惯用语研究提供了真实丰富的资料。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基本词汇最为稳定,俗语等惯用语也相当稳定,《北京俗语儿典》中的部分俗语等惯用语在现代北京官话口语中依然存在。关于俗语等惯用语的北京官话口语研究,多数还停留在考证俗语的来源出处上,鲜从历时的角度对其演变做系统性研究,《北京俗语儿典》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北京官话口

^① 原文是“这话实在不错我看没有一家和睦的”,停顿有些不当,为表意顺畅,笔者改为“这话实在不错,我看没有一家和睦的”。

语历时性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语料。

四、《北京俗语儿典》的历史局限性

《北京俗语儿典》编纂始于日本明治后期,随着当代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理论的日益发展与完善,我们审视 100 年多前的这部词典,发现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1. 在词典编纂理论上一味地强调西学模式,从而忽视了以日语为母语的北京官话口语学习者的“国别”特点。

词典编纂模式固然需要创新,但也要充分考虑学习者自身的“国别”特点。《北京俗语儿典》采用以拉丁字母为序进行检索的方式,就不适合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使用。由于日语与汉语具有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对汉字更加熟悉,认知能力更强。因此,拉丁字母的音序检字法并不适合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反而是部首检字法更适合他们。

2. 强调北京官话口语句型在词典编纂中的地位,也就有忽视词语选取和解释的倾向。^{[7][129]}

《北京俗语儿典》以北京官话口语交际中的常用句式作为引例,强调句型在汉语学习中的重要地位,但也忽视了对词语的选取和处理问题。收词缺乏统一的标准,例如“起早睡晚”、“贱的不贱”、“飞多高儿蹦多远儿”、“喝酒喝厚了”、“喝醉了不算”等。这些短语从其意义及使用上来说,并不能算作真正的俗、谚等惯用语。对词语的解释也不够精确,甚至连最基本的注音形式都没有,这使得在汉语教学中,由于输入信息不足,导致学习者无法正确理解和掌握所学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北京俗语儿典》还存在一些由于编者的不谨慎或汉语水平不高等原因而造成的错误。例如,“锦山添花”应为“锦上添花”,“山”和“上”在发音上接近导致书写错误。再如,在“长江后浪催前浪,一番新人换旧人”的词条中,其引例不是很贴切,没能很好地表达出词语的内涵及真实意义,例句仅体现了词语所包含的“更替”意义,未能表达出其所包含的“进步”意义。

我们当然应该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北京俗语儿典》,尽量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北京官话口语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当代学者对北京官话口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理论演变的深入认识。就世界范围内北京官话教育史研究来说,当然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 考 文 献]

- [1] 王幼敏. 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06 (4).
- [2] [日]下永宪次. 北京俗语儿典[Z]. 东京: 东京偕行社, 1926.
- [3] 周小兵.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J]. 辞书研究, 1997 (1).
- [4] 郑定欧.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刍议[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 (4).
- [5] [英]Cowie A P. English Dictionaries for Foreign learners: A History(英语学习词典史) [M]. 霍庆文, 导读. 北京: 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6]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0.
- [7] 李无未, 等. 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会话”课本[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 (4).

(责任编辑: 曹金钟)